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中国近代合作化思想研究 (1912—1949)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中国近代合作化思想研究
(1912—1949)

张曼茵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合作化思想研究: 1912~1949/张曼茵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 5

(马克思主义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第 22 辑)

ISBN 978 - 7 - 5458 - 0222 - 1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合作经济—研究—中国—1912~1949 IV. ①F129.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5687 号

责任编辑 张玉贞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王晓阳

中国近代合作化思想研究(1912—1949)

张曼茵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 ewen. 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mm 1/16

印 张 26. 75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58 - 0222 - 1/F · 3

定 价 40. 00 元

序 言

合作经济是人们自由联合、互助合作、民主管理的经济组织形式。这种经济组织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 19 世纪中叶的西欧,此时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历史进程中,企业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城市化的发展,带来了资本挤压劳动以及城乡之间的不均衡发展等问题,社会贫富差距急速扩大,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日趋紧张。在这种条件下,基于劳动要素联合起来的合作组织的出现,克服了劳动者个体力量分散和弱小的缺陷,既可以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信用制度,发展壮大劳动者的经济实力;又可以形成与大企业组织进行有效抗衡的力量,保护劳动者利益,因此,合作经济常被称为“小人物在大世界中的机会”。

在世界合作运动史上,英法等国劳动者最初组织的是消费合作组织,后来在向世界各地传播、发展过程中,因地制宜地发展出生产、信用、供销、公用、农业合作等许多形式。到 20 世纪初年,合作经济已经成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系中一支重要力量,农业领域推行合作制度的成效尤其显著,它有效解决了农业分散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问题,对促进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的现代化和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缓和社会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合作经济可以有效弥补市场机制缺陷和政府职能的不足,在国家转型期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当前正处于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三农”问题相对更为突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取消,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传统的农业生产、流通组织,有的已经解体,有的正在改制转型,但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下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严重制约了农民增收和农业的现代化,出现了中国整体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城乡差距却日益扩大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如何发展农民合作组织,新的农民合作组织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便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中国在民国时期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都曾推行过合作运动,实践效果却不尽人意,个中的教训值得反省和总结。基于现实的需要,张曼茵博士选择了《中国近代合作化思想研究(1912—1949)》作为研究课题。该著作通过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引进合作制度以改造社会的思想的考察分析,指出近代中国合作制度在实践中陷入满足政府财政、政治等多重需要的强制性制度安排,既违背了农民的意愿和利益,也桎梏了市场经济发育,合作运动的失败在所难免。

此项研究整理了近代中国合作化思想的发展概貌,从历史逻辑和现代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框架对相关思想资料作出中肯的评析,并提出了不少具有现实意义的观点。对拓展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提升经济思想学术价值颇有意义。

赵晓雷

2010年2月3日

目 录

序言	赵晓雷 1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对象、方法与路径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概念的界定	6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0
第二节 文献回顾	12
一、有关中国近代合作化问题的研究	12
二、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对合作制度的研究	16
第一章 近代中国合作制度思想的西方渊源	23
第一节 近代合作制度在西欧产生的社会 and 思想背景	24
一、近代西欧合作制度产生的社会背景	24
二、近代西欧合作制度产生的思想背景	26
第二节 近代合作制度在英国形成的思想历程	28
一、欧文的合作制度思想与实践	29
二、威廉·金与布莱屯合作制度	32

三、罗虚戴尔合作制度：“个人主义的反动”	34
四、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倡导个人主义结社	39
第三节 罗虚戴尔合作制度在法国的“科学化”	43
一、“法国合作思想之父”：朗吉与傅立叶	44
二、尼墨学派、季特与“自然界公律”	46
第四节 德国的信用合作思想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由来	50
一、德国两派对立的信用合作思想及运动	50
二、拉萨尔与“国家社会主义”	54
第五节 丹麦农业合作成功的思想要素	57
一、合作运动——落后农业国丹麦的工业化道路	57
二、丹麦合作运动成功的思想经验	59
第六节 马克思主义的合作制度思想	65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制度思想	65
二、列宁的合作制度思想	67
三、斯大林的合作制度思想	69
第七节 世界近代合作运动的一般趋势	70
 第二章 中国合作制度思想的早期形态	 73
第一节 “五四”前后中国的合作思潮	73
一、西方合作制度思想在中国传播的背景	73
二、西方合作制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76
第二节 近代中国合作制度思想的初步形成	85
一、中国早期的合作思想流派	85
二、民族主义：中国早期合作制度思想的共同指向	99
三、中国早期合作制度思想的农村定位	102

四、中国早期合作制度思想的“国家化”	104
第三节 华洋义赈会树立中国早期合作制度的典范	107
一、章元善与华洋义赈会合作事业的结缘	107
二、于树德与《信用合作社经营论》	110
三、“渐进”、“引动”的合作制度思想的确立	114
四、华洋义赈会合作事业的典范意义及其局限	122
第三章 政府指导型合作制度思想的确立	126
第一节 近代中国合作运动的“国家化”	126
一、1930 年代前后中国合作运动的“国家化”	126
二、合作制度的“过度供给”：农民“不动”的合作运动	130
第二节 多元思想下的合作制度模式抉择	135
一、华洋义赈会合作制度模式在灾区的救急援用与 扩展	135
二、攻占“中央苏区”的土地合作化计划与实践	138
三、乡建团体的合作制度模式	151
四、商业银行的合作制度模式	154
第三节 政府指导型合作制度思想的确立	171
一、1930 年代初期思想界对政府介入合作运动的二元 主张	171
二、政府指导型合作制度思想的确立	178
第四节 建立合作金融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192
一、“望赈如望岁”：合作运动“国家化”的金融困窘	192
二、国家的企图：商业金融填补国家金融缺位	194
三、建立合作金融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201

第五节 中外学者关于中国本位合作制度的争议	207
一、国内合作思想流派之间的“主义”之争	207
二、中国本位合作制度的争论	215
三、管制还是竞争：中国本位合作制度争论的实质 问题	225
第四章 政府强制型合作制度思想的兴起	229
第一节 战时合作制度思想的转向与结构调整	229
一、国民政府的战时政治经济政策与合作行政的调整	229
二、章元善对自由合作制度思想的困守与终结	231
三、寿勉成与“民主集权”经济制度论	232
四、调整合作制度结构的思想与实践	236
五、工业合作运动兴起的由来	240
第二节 强制型合作制度思想的形成	246
一、新县制下强制型合作制度思想的确立	246
二、新县制“合作事业三年计划”所体现的冒进倾向	252
第三节 建立合作供销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260
一、创立合作供销制度的起因及思想来源	260
二、合作供销制度预期目标落空的原因分析	269
第四节 建立中央合作金融制度的构想	273
一、战时合作金融制度的演变与农贷“防区制”	273
二、建立中央合作金融制度的争议	279
第五节 强制型合作制度的实践效果	284
一、强制型合作制度的产权制度及其绩效分析	284

二、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行合作运动的历史作用	292
-----------------------------	-----

第五章 “民主化、企业化、社会化”的合作制度革新思想的

提出	294
第一节 “民主化、企业化、社会化”改革方针的提出	294
一、国民政府的战后经济重建政策	294
二、“民主化、企业化、社会化”的合作制度革新思想的 提出	296
三、再一次思想“冒进”：“全国合作事业五年计划”	300
四、寿勉成的根本性转变：倡导自由合作制度	303
第二节 经济改革背景下重建中国本位合作制度的争议	306
一、1947 年国民政府的经济改革	306
二、于树德与“民营企业合作化实施方案”	308
三、重建中国本位合作制度的争论	312
四、“到新合作运动之路”	316
第三节 土地改革争论中的土地合作化思想	319
一、土地改革争论中的土地合作化思想	319
二、土地合作化的实践	323
第四节 合作制度革新思想与国民政府相关政策的冲突	329
一、修改合作社法事件	329
二、“民主经济的逆流”风波	333
三、农贷“防区制”的再演	338
四、合作社最后的流变：国民政府对人民“竭泽而渔”的 工具	342

第六章 1949 年以前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制度思想	348
第一节 抗战前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制度思想探索	348
一、中国共产党合作制度思想的开端	348
二、1927—1937 年间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制度思想	350
第二节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制度思想	356
一、抗战时期边区合作运动的进程	356
二、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合作制度思想	358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合作制度思想	362
一、中共主要领导人合作经济在新民主主义国家	
经济构成中的定位	363
二、推行合作制度问题的争论	366
三、解放区的合作制度实践	371
四、1949 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合作制度思想的演进	
特征	373
第七章 近代中国合作制度思想总考察	378
第一节 近代中国合作制度思想的总特征	378
一、民族利益导向下多元合作制度思想的并存	379
二、近代中国合作制度思想的超越性	383
三、国民政府“急则治标”的合作制度政策思想	387
第二节 近代中国合作制度思想的现实价值	392
一、推进当前农村合作制度建设的必要性	392
二、近代中国合作制度思想的现实影响	397
参考文献	403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对象、方法与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

合作化问题是 20 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经济问题之一。合作经济制度发源于 19 世纪中叶的西欧,至 20 世纪初合作经济已成为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尤其是农业领域合作经济制度的推行,解决了农业分散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问题,对推动西方国家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纷纷效仿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和实施各种合作化政策,从而掀起了世界范围的合作运动。清末民初,西方的合作制度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很快就转化为中国各类政治与社会领袖重建农村的政策工具。国民党、共产党、军阀阎锡山与陈济棠、华洋义赈会、晏阳初主持的平民教育派和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派都在农村推行合作运动,政府的相关政策变动频繁、文件迭出,社会各界关于合作问题的主张众说纷陈,争论绵延持久。

为什么近代西方起自社会基层的合作运动在中国却演化成了自上而下的农业经济政策?这些转变是怎样发生的?中国的知识分子

在运用西方的合作理论时又作了哪些具体的转换,使其更切合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近些年来,学术界对这些问题作了一些有益的研究,但大多是从经济史角度考察合作运动的发生、发展及其实践效果,缺乏在制度层面上对各个时期合作制度演变的研究,而从经济思想史角度进行系统研究更是付之阙如。因此,本书选择从思想变迁的角度,研究近代中国合作制度的发展变化,希冀通过对合作制度思想演变的全过程考察,总结出具有历史参考价值的规律性东西。

选择“近代合作制度思想研究”作为课题研究,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 找寻影响近代中国合作制度实践效果的历史因素

1912—1949年是中国借鉴西方合作制度经验、变革农村微观经济基础的最初尝试时期,30多年的制度实践,效果却事倍功半,本书旨在对造成这一问题的历史原因作出解释。本书的一个中心论点是,在缺乏足够资金投入的条件下,国家的不当介入是造成近代中国合作制度无效的根本原因。

1930年以前,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推行合作运动,仅仅表现为舆论上的宣传和倡导,无实质性的行动,在中国办理合作事业较有成效的是华洋义赈会。华洋义赈会总干事章元善把合作社作为改造传统乡村社会,引导中国走向工业化的基本经济单位,“要想改造中国,非由农村入手不为功。中国国民的经济基础是建筑在农村里的,所以惟有将农村的各种问题一一解决,使得农村具备条件之后,才能产生近代的中国。惟有兴办合作,使得农村有了组织,产业才能发展,农民有了购买力,工商业才能振兴,国家才能强盛,这是一条迂回曲折的路线。”〔1〕因此,华洋义赈会遵循“渐进主义”的办社原则,以“引动”农民

〔1〕 章元善:《合作与经济建设》,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38页。

对合作制度的需求为己任,从1923年至1930年的8年时间内在河北68个县扶持合作社277个〔1〕。

1930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推行的土地革命以及1931年长江流域爆发的大水灾,对国民党的统治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国民政府试图利用合作社救济乡村、复兴乡村,以争取乡村的政治支持,援用的是华洋义赈会渐进“引动”的模式。当华洋义赈会的合作制度模式放大为国家政策时,很快就变了形。由于政府推行合作的方针摇摆不定,合作行政机构兴废无常,经费来源不稳,地方合作指导人员普遍配备不足。1934年,江西省平均每县不到一人,即便如此,合作指导人员的薪给尚无着落,不得不从合作基金的贷款利息中拨出〔2〕。政府对农村合作贷款的资金投入更是微不足道,1933年以办理“农村合作”为主要理由建立的四省农民银行,对合作社的放款只有区区30802元〔3〕。为筹措对合作社的放款资金,国民政府于1934年7月通过一纸《储蓄银行法》,企图以商业金融来填补国家金融的缺位,令商业银行的资金运用“对于农村合作社之质押放款,及农产物为质之放款,不得少于总额五分之一”〔4〕。商业银行考虑到农村投资的薄利与不安全,放款资金也很有限,这些微量的资金还要考虑及时收回以实现循环,在这种情况下贷款就只能流向中农和条件优越的农户,让官僚和地主利用合作贷款剥削农民〔5〕,根本无法增加农业生产和缓解农村贫困。

抗日战争爆发后,依托保甲制的合作制度模式被强行推展到整个国统区。1940年颁布的《县各级合作社组织大纲》明确规定“以乡(镇)

〔1〕 于树德:《本会农村合作事业之鸟瞰》,《合作讯》第100期。

〔2〕 宁档:全宗号44,案卷号2807,江西农村合作委员会公函,1934年。

〔3〕 程乃丰:《中国农民银行与合作运动》,《中农月刊》第5卷第12期。

〔4〕 王维骥:《储蓄银行农村投资不得少于存款总额五分之一之商榷》,《银行周报》第18卷第45期。

〔5〕 陈翰笙:《三十年来的中国农村》,《中国农村》第7卷第3期,1941年。

为中心,并逐渐普及各保合作组织,以达到每保一社,每户一社员为原则”。保合作社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可以解散:1. 与他合作社合并;2. 破产;3. 解散之命令。至于合作社的社员,只有在加入的保合作社或者县联社解散时方可出社^{〔1〕}。农民事实上被强行编入合作社,失去了退出权。这样,通过国家政权基层机关和乡村经济单位的重合,在8年的时间里,合作社由战前的46 983个^{〔2〕}发展到1944年的160 229个^{〔3〕},乡村经济中形成了以乡(镇)社为控制中心,遍及到保社,延伸到各个农户家庭的纵向联系的经济体系。国家政权的扩张不仅深入到乡村的政治和社会领域,还可以进入乡村经济运行内部,利用乡村内部人员控制纵向体系中的每一个环节,直接掌握了乡村的几乎全部资源,却无需支付必要的费用,大大节约了控制成本。但是国家却难以形成对其乡村代理人的有效约束,他们依仗国家权势,借口举办合作社加大对农民的压榨,令农民谈“合”色变,合作组织根本无经济效率可言。国民政府利用这种快速建立的“合作网”集中了有限的人力物力,支持了战争,却失去了民心。解放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加强了地方势力对合作社的控制和盘剥,最终,过度的资源提取使饱受倾轧之苦的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生活极端困苦,国民政府彻底失去了农民的政治支持,从而经济基础不能支撑上层建筑,导致政权的颠覆。

可见,近代中国合作制度的变迁,远不是单纯的经济上的适应性调整,总是和变换时代下特定的政治、社会目标联系在一起,呈现出“急则治标”^{〔4〕}的应时性。近代中国合作制度的变迁映照了一个时代

〔1〕《县各级合作社组织大纲》,《中农月刊》第2卷第2期。

〔2〕宁档:全宗号11,案卷号重-947,社会部合作事业管理局与物品供销处工作报告及成绩总检阅报告表,1941年。

〔3〕宁档:全宗号11,案卷号371,合作事业管理局工作检讨报告,1945年。

〔4〕章元善:《合作与经济建设》,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48页。

的变动。那么,在制度变迁的背后,思想的力量是如何影响政府决策的呢?从思想史角度研究近代合作问题不仅可行而且必要,它又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上的经济制度是如何运作的,总结其限制因素和促进因素,从中受益并减少盲动性,这是形成本选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寻求推进当前农村合作制度建设的可行思路

发展现代农业,实现中国农业的现代化,保证农民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收益,是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宏观目标。从现实角度看,我国农村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农业现代化不能盲目追求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必须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基础上,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引导农民走产业化经营的道路。那么,如何在不触动农民土地所有权情况下,组织农民实现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合作组织对提高我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发展产业化农业具有重要意义,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合作组织不触动农民私人财产权,同时追求公平和效率,在中国农村存在着极大的制度需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许多地区涌现了各种形式的合作组织,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是农民自发的组织要求。对于农村出现的这种制度创新,国家政策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1月8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更是指出要根据需要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近些年来各级政府也利用法律、经济等手段积极地介入了合作社的发展。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着力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作为推进农业经营机制创新、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并特别强调要“按照服务农民、进退自由、权利平等、管理民主的要求,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快发展,使之成为引领农民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

国家政策的倡导促使学界进一步积极探索推进和完善目前我国农村合作制度建设的可行思路,学者们的争论集中在一些焦点问题上,诸如:采用哪种合作制度模式、经由何种路经组织农民才能符合农民的利益和要求?政府介入合作社发展,如何戒除实践中常常出现的“越位”、“缺位”和“虚位”等现象,在帮助农民组织与维护组织独立性之间保持平衡?怎样化解合作制度所内涵的公平与效率两难的困境?

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昨天的制度安排是向今天制度演进过程中的一部分,将现实与历史结合进行综合分析,有助于推动我们进一步的思考。1912—1949年是中国将西方合作制度引进、试验、推广的最初时期,30多年的合作理论与实践积累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之加以系统梳理研究,揭示合作制度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提炼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的合理因素,对于推进当前中国合作制度建设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综而言之,从一个新的视角研究近代中国合作制度的变迁,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空缺,丰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体系,更为重要的,在于从历史经验中寻找出对今天农村合作制度建设有指导意义的启示。从这点来说,笔者认为,一个稳定而有效率的农村合作制度的形成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发源于农民经济主体内在需求的制度安排才是有意义的,因为农村经济成长的真正要素存在于农民对自己利益追求的流程中。

二、概念的界定

“合作”一词源于拉丁文,其原意指成员之间共同行动或协作行动的意思。合作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自从有了人类活动就存在。1844年,英国罗虚戴尔合作社的成立赋予“合作”一词特殊的经济内涵,特指合作社社员之间互相合作的一种特定的劳动形式,他们把这种意义